



衡阳史话之文化篇 11

湖湘学派的发源地（七）

朱张二人志同道合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无论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还是在湖湘学派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即朱熹和张栻的衡岳会讲。后代学者每每论及此事,均是称道不已。元代理学家吴澄说:“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骤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

所谓“会讲”乃是古代书院教育制度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交流活动的,是南宋时期不同学术流派或持不同学术见解的学者就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它提倡自由讲学,各抒己见,辩论学术,各倡义理。正如《朱子语类大全》中所说:“往复诘难,其辩愈详,其义愈精。”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南宋书院史上最早的一次会讲,当属张栻、朱熹的衡岳嘉会。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历史铭记了乾道三年秋,发生了一件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远道来湘,拜晤张栻。两位理学大师,促膝长谈,切磋学术,互点迷津,阐发义理。二人从岳麓书院一路长谈到南岳深山,看遍麓山红叶再览南岳白雪,这就是学术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

理学是儒学的革命,儒学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学发展与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虽传承了孔子的精义,但历代儒学都在变换着不同的面孔以适应不同的时代精神和王权政治的需要。儒学发展到宋初时,儒学在佛道的夹击下,渐呈式微之势。宋儒为重振儒学雄风,开始进行儒学变革,经过无数学者呕心沥血的思考和耕耘,终于开出了儒学的新生面——理学。

宋代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集大成者却是朱熹。周敦颐与朱熹都与衡阳有过密切的关系。周敦颐年少时曾在衡阳的舅舅家读书,衡州石鼓书院当时声名一时,对他日后为学有过直接影响。朱熹在南岳与张栻论道,又为石鼓书院作记,这都是儒学变革的大事。

理学是儒学历史演变中的一大历史文化景观。理学是由无数学派构成的。理学变革儒学又是以无数学派和学术大家的精心演绎推波助澜,蔚为壮观。

张栻与朱熹,都是理学标志性人物。张栻是湖湘学派的代表,朱熹是闽学的代表。张栻弘扬湖湘学精义,昌明湖湘学于天下;朱熹博览理学学派,独领一代风骚,集理学之大成。俩人同为学术大师,学术观点同中有异,学术追求各有标新,但却又是人生挚友。

朱熹与张栻当时名重一时。二位学术大师会讲衡州,这对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张二人志同道合。朱熹由闽入湘,张栻当时主讲岳麓,聚首衡岳,开始了一段令人景仰的学术交往活动。

张栻少时就在南岳师从胡宏,后为官地方州府,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受聘为岳麓书院教事。朱熹一生大多在福建为学,以二程为宗。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任南岳庙监。在此期间,他身受湖湘学风的影响。胡氏父子在南岳“卒开湖湘之学统”。乾道三年(1167年),已在福建为官的朱熹十分关注学风正盛的湖湘学派,他决定前往湖南,与张栻会面,切磋学术。此时,张栻已为岳麓书院主讲。朱熹与张栻之所以会讲衡岳,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学术情谊的。

朱张二人志同道合,精忠为国。朱张生活的时代,

正是宋室南渡之后,偏安一隅,国势日弱。面对金人的不断进攻,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对立,水火不容。当时仁人志士莫不主张强兵富国,抗击金兵,收复中原失地。朱张二人深受父辈影响,倡明爱国大义,以社稷为重,力主抗金。朱熹父亲朱松进士及第后,痛斥主和派秦桧的乞和卖国主张。此举自然遭到秦桧党羽的排挤,朱松被贬,出知饶州。他到饶州后手书苏轼《昆阳赋》授予朱熹,让儿子明白古今成败兴亡大事。

朱熹少时就受其父爱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宋孝宗即位后,朱熹任南岳庙监,曾奋笔上书:“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仇耻未除,戒虜之奸谄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朱子大全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他提出罢黜和议,强兵富国,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力图收复失地。

张栻一生亦是崇义为重,其父张浚,曾在宋高宗、孝宗两朝担任丞相,反对和议,力主抗金。张栻秉承父志,不忘靖康之耻,矢志报国。他大义凛然,不投人主之所好,敢于直言进谏。他直言孝宗,匡复社稷要励精图治,“亲君子远小人”,朱熹对张栻的大义气节甚为钦佩,他评价道:“呜呼!靖康之变,国家之祸乱极矣。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天几人;而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又未有如公者。”(《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

皆为宋代理学创学代表

正因为朱张二人以爱国立志,他们才能走向志同道合之途。他们在学术上都是要重振儒学雄风,以孔孟正学拯救人心。朱熹与张栻都是宋代理学的创学派代表。

张栻是当时气势最盛的湖湘学派的代表,他的思想对朱熹的理学集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熹是闽学的代表,虽然闽学当时的影响不及湖湘学派,但两大学派学术各有追求、各有主张,学脉相通。

张栻之学与朱熹之学都以二程为宗,所以他们“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见识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黄榦《朱子行状》)。所谓“以一其归”便是指张栻与朱熹二人的学术传承归宗于二程之学。

从学术渊源上来讲,朱熹和张栻的学术思想来自二程的洛学,故学术渊源同出一脉。但在一些学术见解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一方面是二程之学本来就有区别:程颢偏重于主观唯心论,程颐偏重于客观唯心论。朱熹受小程(程颐)的影响较多,而张栻则受大程(程颢)影响较多。

另一方面他们的师承关系也不同:朱熹一派是由杨时经罗从彦、李侗而至朱熹,称为“闽学”,以福建为基地。张栻一派是由谢良佐经胡安国、胡宏而至张栻,称为“湖湘学”,以湖南衡山为基地。加之他们的个人经历、生活环境不同,因而在不少问题上意见相左,双方都感到有会讲的必要。

朱熹决定前往湖南和主讲岳麓书院的张栻“会见讲论”,切磋学术。当时有很多人包括他的友人与学生,都对朱熹的湖南之行进行劝阻,但他决意前往。是年8月,朱熹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陪同自福建崇安启程,9月8日抵达湖南长沙,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朱熹在长沙的岳麓书院住了两个多月时间,双方就有关的学术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讨和激烈的辩论。据朱熹侍行的学生范伯崇说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但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损害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此期间,朱熹还被邀请在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湖湘弟子闻之,远道前来听讲学者如云,盛况空前。

朱熹与张栻在南岳“讲磨辩难”说明他们为学都以

二程为宗,但又各有学术主张。他们各有高见,又互为发现,互相切互相交流。

朱张二人的“道合”,其旨在理学主题与目的的认同上。理学的主题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理”,理学的目的那就是“穷理尽性”。二程“穷理尽性”“明道致用”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对朱熹和张栻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与张栻归宗二程之学,都以“明道”为己任,但二人在“穷理尽性”上,又走出了各自的学术道路,使得理学发展多变多彩,显现生命活力,当时名重一时的“东南三贤”(张栻、朱熹、吕祖谦)都十分重视“四书”的研究和阐发,他们认为这四部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之道。他们通过对“四书”的阐发,大讲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使理学发展呈现心性之学的基本特点。张栻精研“四书”,著有《论语解》10卷,《孟子说》7卷;朱熹更以《四书集注》奠定了“四书”与“五经”并列的历史地位。朱张二人于儒学义理源本探幽,疑解究极。

“穷理”是理学的根本。朱张二人一生都在治经穷理,但他们论理就大相径庭。张栻与朱熹先后论理多次,反映了二人各自代表的学术主张。

理或者说是天理,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地位是不同的。在朱熹那里,理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纲,理是至高无上的本体意义的最高范畴,是天道与人道的最终依据;在张栻那里,太极是他哲学体系的核心,太极是具有绝对性的本体意义的最高范畴,是宇宙世界的最终依据。张栻也讲天理,承认理的本体地位,认为天理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但张栻之理与朱熹之理的差异在于,理只是宇宙万物之所以然,而不是宇宙万物之必然,也就是说张栻所言之理只是天道一部分,并非天道全部;而朱熹之理则是天道全部,既是宇宙世界之所以然,又是宇宙世界之必然。正因为论理的不同,张栻以太极为本建立了太极本体论,朱熹以理为本建了理本体论。张栻与朱熹从各自本体论出发又对心、性及一系列基本范畴展开了讨论。

朱张会讲名垂千史

朱张论学最多的不是本体论方面的问题,而是心性论方面的问题。从根本上讲理学是心性之学,理学是主张通过内圣去实现外王的道德性命之学。在探讨心性问题时,张栻首先提出了“心主性情”的命题,强调道德主体的理性自觉,主张人的理智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情感的主导作用,这对朱熹的“心统性情”产生直接影响。朱张的心性之论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四书”的道德性命之学的关注。二程以《大学》为修身入道之门,以《中庸》为道德性命之纲。纲举才能目张,朱张二人提纲《中庸》,对道德主体的修养功夫进行辩论。据朱熹学生范伯崇记述,他们讨论问题,不分昼夜,尤其对《中庸》之义,争议尤深,“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可见,他们对《中庸》的道德性命之学尤为关注。其中“未发”与“已发”是朱熹与张栻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未发”与“已发”是《中庸》对道德主体心性状态的一种描述,意即人的心性如何适度。《中庸》如是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讲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是一种“中”的状态,“已发”出来加以节制符合人性规范,这是人性的和谐理学对《中庸》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视。在“未发”与“已发”关系上,湖湘学派的认识有自己的特点。胡宏曾以“未发”言性以“已发”言心,性为天地之性,其本然状态是静的;心为道德主体之心,心动可见性。张栻继承

了师说,并进一步以心为万物主宰,以道德主体之心去体性为仁。

朱熹在与张栻讨教这个问题之前,曾从学李侗。李侗主张通过默坐静心去体认天理。他认为天理只能在喜怒哀乐“未发”的本始状态中才能显现,是耳目感官无法把握的,人要体认天理,就必须“默坐澄心”。李侗的静心之教对朱熹有直接影响,但他一直对“已发”与“未发”之度心存疑惑。为解疑惑,他在会讲张栻时,重点请教这个问题。

张栻阐明湖湘学派的修身功夫,不以默坐静心求未发气象,而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要在“已发”处下工夫。朱熹当时并不以为然,三思之而后觉得张栻言之有理。后来朱熹谈到了张栻对自己的启发,他说:“钦夫去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发尔。自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吉父论未发之旨者,其论又适与余音合,用是益自信。’”(《中和旧说序》)

“性”是湖湘学派立论的根本。胡宏以性标本天地,张栻以性善主张宇宙万物,朱熹对湖湘学派以性为天下大本的说法极不赞同。朱熹是以理作为宇宙本体的,理是宇宙万物的本质问题性与理的分歧,是湖湘学派与朱子之学的根本分歧,也是朱张辩难的一个根本问题。

朱张会讲辩难,不仅开启自由讲学之风气,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是南宋理学的两大流派。朱张会讲呈现了理学发展的一大奇观,即不同学术流派在自由论争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朱熹在言及张栻对自己的影响时说:“熹闻道虽晚,赖老兄掖之赐,今幸略窥。”(《与张敬夫》、《文集》卷三十)张栻光大湖湘学派,也得力于朱熹,“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招与博约,又大进焉”(《宋史·道学序》)。尽管朱熹与张栻经过多年的论学辩难,俩人在理学许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他们理明道的精神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朱熹与张栻并没有因学术歧见而分道扬镳。他们在论学辩中更是情深意切,切齿没忘。宋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二日张栻逝,卒年48岁。噩耗传来,朱熹悲痛万分,不禁仰天长啸,吾道益孤!“(《答黄直卿》《文集》续集卷一)朱熹一生难忘会讲情谊,他为张栻写下祭文:“惟我之与兄,志同道合,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所共向,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谢纷往返者,几十余年,未有同归而一致者。”(《全集》卷八十七)

朱熹在祭文中坦然心迹,他与张栻论争,是“志同道合”之论,是“心契”之争。正因为朱熹与张栻志同道合,他们才会会讲这一学术形式演绎了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气象。

(本报记者 胡建军 实习生 刘铭铨 根据《衡阳历史文化丛书文化史论》编辑整理)



朱张会讲雕像



今人想象中的朱张会讲



康熙《岳麓志》所载朱熹像